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来自云南 106 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缪小林[1],伏润民[1],王　婷[2]
(1. 云南财经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221;2. 云南大学 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文章以云南 106 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方财政分权;县域经济增长;财政努力;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2.7;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4)09-0004-13

一、引　言

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展开着财政分权改革,中国也不例外。1994 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拉开了我国财政分权的序幕,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关系不断分化和调整的背景下,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也在探索和完善适应自身发展的财政分权制度。毫无疑问,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和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具有积极的作用,20 年来的分税制改革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更成就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并具有典型的区域二元特征,对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仍然延续这种"大上大下"的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是否还能为县域经济增长注入持续的动力,值得深入思考。尤其是在与"高财政支出—高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日益暴露的背景下,理清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及其传导机制,对完善我国地方财政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我国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举措。

收稿日期:2014-06-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136);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2011Z073)
作者简介:缪小林(1983—),男,四川江安人,云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伏润民(1964—),男,云南罗平人,云南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　婷(1983—),女,辽宁辽阳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由于我国县域内市场机制并不完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重要生产要素匮乏,以政府为主导的财政支持政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也因此成为国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周振东,1994;钟鹏声,1998;李乃杰等,2002;赵吉成等,2005;周元元,2006;王振宇,200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财政对县域经济虽然有积极作用,但作用正在逐渐弱化,甚至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邓子基和杨志宏,2012;王朝阳等,2012)。实际上,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弱化,从政府行为角度来看则直接表现为地方财政努力程度的降低。对此,很多学者认为转移支付制度对财政努力将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落后地区这种抑制作用更加明显(Correa 和 Steiner,1999;乔宝云等,2006;张恒龙和陈宪,2007;刘勇政和赵建梅,2009;李丹和刘小川,2014)。

可见,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地方财政分权作为省以下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作用机制将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再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构建地方财政分权、县级财政支出与县域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第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来引导生产要素的集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等来实现,可能受到贫富差距、民族特征、边境条件和特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计量模型中将引入上述因素加以控制,并通过对这些控制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交叉项的估计,深入挖掘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第三,基于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及传导的模型估计,初步计算最优地方财政分权度,并与实际地方财政分权度进行比较,提出缩小这种分权偏离问题的省以下地方财政体制调整的思路。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现有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围绕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展开(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温娇秀,2006;周业安和章泉,2008;周东明,2012;等)。这些研究为本文研究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针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区域间的差异等问题,相关学者也进行了传导因素分析(温娇秀,2006;王新军和赖敏晖,2010;李国璋和刘津汝,2010)。毫无疑问,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固然重要,但挖掘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更为重要。Oates(1972)指出,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充分的信息优势,财政分权有助于提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伴随着财政权力与责任向基层转移,在辖区自身利益的诱导下,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培植财源和加快经济发展,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提升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率。Olson(2000)指出,财政分权实际上是中央政府采取"攫取之手"和"援助之手"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资源分配的过程,这种分配过程将影响地方行为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可见,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离不开经济效率(殷德生,2004),这种经济效率实际上是财政努力行为的结果。为此,我们可以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归结为:财政分权所代表的政府间利益分割使得地方政府不仅努力追求地方财政收入,而且还具有"向上负责"的激励导向(Blanchard 和 Shleifer, 2000),尤其是这种以晋升为目标的政治激励导向将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梅东州,2014),进而影响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进一步,较多学者还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并非表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由此存在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问题,也即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U"形关系(殷德生,

2004;刘小勇,2008;宋玉华等,2008;刘金涛和曲晓飞,2008)。这些研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超线性检验与分析,为本文构建计量模型提供了借鉴。

上述研究在判断和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已经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是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中央与省的财政分权,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更多地是规范中央与省的财政分配关系,就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基本由各省自行规定,省级政府在明确中央和省级财政关系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再重新确定省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收入分享和收入上解等各项分配制度。因此,就县域经济增长而言,分析省以下地方财政分权对其产生的影响及传导机制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共识,且这种影响关系会因为不同环境条件而存在区域差异。更确切地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政府间利益分割条件下,与财政支出行为相伴随的财政努力,以及进一步所决定的经济效率差异。正因如此,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不是表现为分权水平越高或越低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存在基于经济增长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分权的程度。依据上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针对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其作用并非线性关系,即在初始阶段省级政府集中较多财权有利于更好地配置资源,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着集权程度的提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会逐渐降低,最后出现抑制作用。

假设2: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通过对县级财政支出行为的传导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即分权关系将改变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决定这种财政行为的经济增长效率。

假设3: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依赖于经济行为和地区特征等因素,即在不同的外生因素条件下,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为了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以下模型:

$$PGDP_{it}=\beta_0+\beta_1 PPFE_{it}+\beta_2 GHA_{it}+\beta_3 GHA_{it}^2+\beta_4 OSA_{it}+\beta_5 OSA_{it}^2+\Theta CON+\mu_{it} \quad (1)$$

其中:i代表县域个数,t代表时间范围,μ_{it}表示随机误差项(其他见下文变量定义)。

模型(1)中引入财政支出变量主要是考虑财政分权是通过财政支出传导发挥作用,将财政分权变量设定成二次型主要借鉴刘金涛和曲晓飞(2008)等人的研究。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多,在构建的计量模型中引入相关控制传导变量,以此反映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独立影响。

进一步地,从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路径来看,一方面,表现为财政分权促进消费者效率和生产者效率的过程(Oates,1993;Swell,1996),消费者效率和生产者效率实际上是经济行为表现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断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经济行为依赖;另一方面,表现为财政分权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会受区域特征的影响,比如文化特点差异、人口流动性差异和财政资源差异等都会导致在财政分权体制下表现出不同的财政行为(温娇秀,2006),因此可以认为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地区特征依赖。结合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在经济行为依赖方面主要选择投资选择、消费选择、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等变量,在地区特征依赖方面主要选择贫富差距、民族特征、边境条件和特殊政策等变量。综合来看,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路径主要通过财

政支出传导发挥作用;间接路径还依赖于经济行为和地区特征发挥作用(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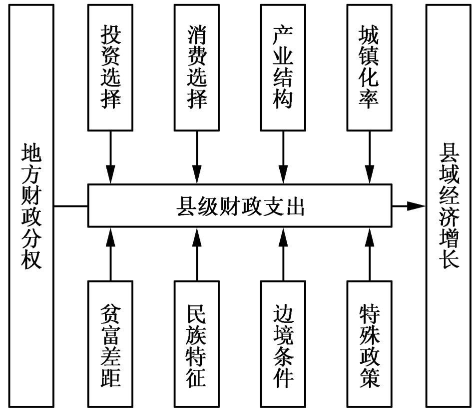

图 1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的过程包括:一是检验地方财政分权是否影响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是否存在经济行为依赖,三是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是否存在地区特征依赖。为实现上述检验,主要在模型(1)基础上指定条件冲击变量和比较影响变量,并引入这两个变量的交叉项进行估计,其中:条件冲击变量指间接发挥作用的变量,用 M_{it} 表示;比较影响变量指直接发挥作用的变量,用 X_{it} 表示。将模型(1)转化为:

$$PGDP_{it}=\beta_0+\beta_1 X_{it}+\beta_2(M_{it}\times X_{it})+\Theta CON+\mu_{it} \tag{2}$$

令 $M_{it}=M^{max}$,则存在:

$$PGDP_{it}=\beta_0+(\beta_1+\beta_2 M^{max})X_{it}+\Theta CON+\mu_{it} \tag{3}$$

令 $M_{it}=M^{min}$,则存在:

$$PGDP_{it}=\beta_0+(\beta_1+\beta_2 M^{min})X_{it}+\Theta CON+\mu_{it} \tag{4}$$

并假设 $M^{\max}>M^{\min}$,在 β_1 显著的情况下,如果交叉项估计系数 β_2 显著为正,则存在 $\beta_1+\beta_2 M^{\max}>\beta_1+\beta_2 M^{\min}$,说明比较影响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受条件冲击变量的正向拉动;如果 β_2 显著为负,说明受条件冲击变量的负向拉动;如果 β_2 不显著,说明不受条件冲击变量的影响。另外,在 β_1 不显著的情况下,不存在比较影响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更不能说明条件冲击变量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人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PGDP_{it}$)。县域经济发展涵盖的内容较广,但其核心和前提在于经济增长,因此选择人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1)上级补助占县级财政支出比重(GHA_{it}),反映县级财政与上级财政在支出方面的权利分割情况,该比重越高,县级政府在支出上的独立性越弱,其中:上级补助主要包括返还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2)上解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OSA_{it}),反映县级财政与上级财政在收入方面的权利分割情况,该比重越高,县级政府在收入方面的独立性越弱,其中:上解支出主要包括体制性上解和专项上解。

3. 控制传导变量。财政行为方面的传导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财政支出($PPFE_{it}$),反映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

经济行为方面的传导控制变量包括:(1)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FAI_{it}$),作为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变量,具有正向作用,代表投资选择;(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PCGS_{it}$),作为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变量,具有正向作用,代表消费选择;(3)二三产业产值比重($NAPP_{it}$),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等行业转变有助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代表产业结构;(4)城镇化率($URBA_{it}$),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可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能够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代表城镇化率。

地区特征方面的传导控制变量包括:(1)特殊政策($dum1_{it}$),如果某县属于县域经济发

展重点县，则 $dum1_{it}=1$，否则 $dum1_{it}=0$；(2)民族特征($dum2_{it}$)，如果某县属于民族州所属县或民族自治县，则 $dum2_{it}=1$，否则 $dum2_{it}=0$；(3)边境条件($dum3_{it}$)，如果某县属于边境县，则 $dum3_{it}=1$，否则 $dum3_{it}=0$；(4)贫富差距($dum4_{it}$)，如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平均值的县，则 $dum4_{it}=1$，如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平均值的县，$dum4_{it}=0$。

4. 工具变量。在上述计量模型中，人均财政支出作为解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量，但同时地区生产总值又决定着人均财政支出，从而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人均财政支出将可能是内生解释变量。根据本文的数据特征，我们将选择人均财政转移支付(IVT_{it})和人均财政供养人员(IVC_{it})作为工具变量，其理由是这两个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不存在关系，但与内生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有直接的关系，前者是人均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构成，后者是人均财政支出的重要支出依据。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相关性分析。本文以西部地区的云南省为例进行分析，主要选择2005－2010年[①]该省106个县域[②]样本的上述14个变量指标，其中人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指标均取其自然对数。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6－2011)。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线性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上级补助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重和上解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与人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05和－0.11，不具有线性相关性，因此需要检验其非线性关系。另外，两个工具变量人均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均财政供养人员分别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都较低，而与内生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有较高的相关性，分别为0.96和0.52，符合选择工具变量的要求。

表1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变量	*PGDP*	*PPFE*	*GHA*	*OSA*	*PFAI*	*PCGS*	*NAPP*	*URBA*	$x1$	$x2$	$x3$	$x4$	*IVT*	*IVC*
PGDP	1.00													
PPFE	0.61	1.00												
GHA	－0.05	0.10	1.00											
OSA	－0.11	－0.26	－0.03	1.00										
PFAI	0.74	0.74	0.07	－0.20	1.00									
PCGS	0.86	0.64	0.05	－0.16	0.69	1.00								
NAPP	0.12	0.20	－0.42	－0.01	0.20	0.17	1.00							
URBA	0.38	0.18	－0.21	0.02	0.31	0.30	0.04	1.00						
$x1$	0.43	－0.05	－0.09	0.02	0.20	0.32	－0.17	0.18	1.00					
$x2$	－0.12	0.14	0.10	－0.07	－0.07	0.04	0.06	－0.02	－0.25	1.00				
$x3$	－0.10	0.15	－0.01	0.08	0.09	0.01	0.11	0.17	－0.19	0.23	1.00			
$x4$	0.67	0.20	－0.08	0.11	0.42	0.50	0.02	0.34	0.47	－0.11	－0.08	1.00		
IVT	0.40	0.96	0.15	－0.26	0.62	0.48	0.20	0.04	－0.19	0.23	0.21	0.03	1.00	
IVC	0.15	0.52	0.09	－0.02	0.26	0.20	0.09	0.18	－0.22	0.39	0.23	0.18	0.55	1.0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以下将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各类假设进行检验，针对各时期影响采用变截距模型，并用 F 检验判断是选择混合模型还是个体模型，再根据 *Hausman* 检验判断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样本容量中截面单位较多而时间较短，容易出现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因此采用 *Cross-Section SUR* 加权估计进行计量检验。

①选择2005－2010年代表一个完整的地方财政体制周期。

②云南省共有129个县(市、区)，而本文分析的是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剔除了23个市(区)，仅针对106个县进行分析。

（一）内生性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我们知道，人均财政支出从直接需求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将促进县域经济增长，而县域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为财政支出创造财力基础。因此，可以初步判断人均财政支出至少是一个内生解释变量，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对其他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进行逐一检验。这里采用 *Hausman* 设定检验对县域经济增长与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从表 2 检验结果看，在计量模型（1）中，除反映地区特征的特殊政策、民族特征和边境条件外，其余解释变量与 $PGDP_{it}$ 之间都存在内生性。关于人均财政支出的内生性问题，前文已经作出解释。针对财政分权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伴随着县域经济增长的变化，省级财政完全可能对其补助和上解作出相应调整。针对投资、消费、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等经济行为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可以解释为县域经济增长所决定的产出基础，将反过来影响政府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另外，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也必然带来差距的拉大，因而贫富差距与县域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内生性。

表 2　基于残差项估计的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及检验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残差项	系数	−7.43	−11.10	3.75	0.20	3.58	−2.03	0.88	0.09	0.27	−0.67	−0.29
	P 值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0.59	0.23	0.56	0.01
内生性判断		*PPFE*	*GHA*	*OSA*	*PFAI*	*PCGS*	*NAPP*	*URBA*	$x1$	$x2$	$x3$	$x4$
		Y	*Y*	*Y*	*Y*	*Y*	*Y*	*Y*	*N*	*N*	*N*	*Y*

注：“*Y*”表示相应解释变量是内生解释变量，“*N*”表示相应解释变量不是内生解释变量。

2．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本文选择人均财政转移支付（IVT_{it}）和人均财政供养人员（IVC_{it}）作为工具变量，由检验可见，人均转移支付和人均财政供养人员变量分别与各内生解释变量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相关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工具变量与人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没有必然联系，表 1 所呈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0 和 0.15。但我们仍然需要对该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进行检验：首先，我们在对以 $PGDP_{it}$ 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方程中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估计，提取相应残差项 $resid2_{it}$；其次，利用上述残差项对所有外生变量进行回归，得到 R^2 为 0.044；最后，计算卡方统计量为 1.231，而卡方统计量的临界值为 3.841，则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与残差不相关的原假设，认为所选工具变量有效。因此，我们确定以人均财政转移支付（IVT_{it}）和人均财政供养人员（IVC_{it}）作为工具变量，对各类假设检验进行 2*SLS* 回归。因为对模型进行检验时，所有方程都尚未通过 *Hansman* 检验，所以以下将直接报告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二）假设 1 检验：地方财政分权是否对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及方程形式。表 3 中的方程（1）和（3）检验了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线性关系，方程（1）仅加入人均财政支出作为传导变量，得到上级补助占县级财政支出比重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上级补助占比越高，对县域经济发展阻碍越大，可能原因是这种高额补助容易形成县级财政对上级补助过度依赖而削弱了自身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与乔宝云等（2006）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样得到，上解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比重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上解支出占比越高，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激励效应越大，这也验证了刘小勇（2008）得出的研究结论，即省级政府控制较多的收入权有利于增强省级政府对县域经济的调控能力。方程（3）加入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化率和反映地区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后，方程整体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上级补助占县级财政支出比重的

影响系数依然是显著为负，只是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而上解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比重的影响系数则开始变得不显著。表3中的方程(2)和方程(4)报告了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二次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上级补助占比和上解支出占比的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上级补助占比和上解支出占比分别与县域经济增长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这也与刘金涛和曲晓飞(2008)所得出的结论一致。揭示出随着上级补助占比和上解支出占比的提升，开始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越到后面将出现抑制现象，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1。

从传导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来看，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城镇化率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以调整的 R^2 较高的方程(4)来看，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或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每增长1%，以及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或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能够带动人均县域生产总值提升0.09%、0.32%、0.12%和0.54%。另外，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县特征以及发达地区特征能够提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概率；相反，民族和边境特征将会降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概率。

表3结果表明，控制相关传导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后，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更为稳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二者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此外，之所以上级补助占比与县域经济增长在线性估计上表现为稳定的负向关系，说明绝大部分县域地区上级补助占比的实际值已经超过倒“U”形曲线的拐点。而上解支出占比与县域经济增长的线性估计不显著，说明各县域地区上解支出占比还分散在倒“U”形曲线拐点的两侧。

表3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及检验指标		(1)		(2)		(3)		(4)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核心解释变量	GHA	−2.97	0.00	3.34	0.00	−1.20	0.00	3.25	0.00
	GHA^2			−4.29	0.00			−3.05	0.00
	OSA	0.47	0.00	3.55	0.00	0.12	0.28	1.40	0.00
	OSA^2			−8.36	0.00			−3.23	0.00
传导控制变量	PPFE	0.60	0.00	0.67	0.00	0.19	0.00	0.25	0.00
	PFAI				0.08	0.00	0.09	0.00	
	PCGS				0.37	0.00	0.32	0.00	
	NAPP				0.13	0.03	0.12	0.06	
	URBA				0.22	0.01	0.54	0.00	
	dum1				0.06	0.00	0.06	0.00	
	dum2				−0.02	0.03	−0.03	0.00	
	dum3				−0.07	0.00	−0.09	0.00	
	dum4				0.21	0.00	0.18	0.00	
常数项	C	6.59	0.00	3.63	0.00	4.73	0.00	2.94	0.00
调整的 R^2		0.73		0.75		0.87		0.88	
F		638		457		394		358	
样本容量		636		636		636		636	

(三)假设2检验：地方财政分权是否影响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表4中的方程(1)到(4)报告了地方政府分权影响县域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总体上看，人均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为显著正向作用，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保持为显著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从表4中的方程(1)和(2)可以看出，上级补助占县级财政支出比重与人均财政支出的交叉项系数均分别显著为负，说明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地方财政支出分权的负向影响，即上级补助占比越高，越容易降低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增长的努力程度。从表4中的方程(3)和(4)可以看出，上解支出占县级

财政收入比重与人均财政支出的交叉项系数均分别显著为正,说明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影响,即上解支出占比越高,越能提升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增长的努力程度。

实际上,上级补助占比较高的地区几乎都是经济较为落后和财政资源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以“保工资、保运转”为主要财政目标,财政支出重点是人员工资和公用经费等行政运行支出,加上这些地区天然缺乏经济增长的资源禀赋,在投资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支出显然不会太多。因此,上级补助占比越高,这些地区长期形成的上述支出行为惯性将随之导致行政运行支出占比增高,从而不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尤其是针对不指定用途的财力性补助更是如此。而上解支出占比较高的地区一般都是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在财政运行方面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财政支出更多地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等为主。因此,上解支出占比越高,就越能够激励这些地区的支出努力程度,将更多的支出用于经济发展上来,创造更雄厚的财力基础。

表 4 地方财政分权是否影响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及检验指标		(1)		(2)		(3)		(4)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比较影响变量	$PPFE$	0.34	0.00	0.96	0.00	0.23	0.00	0.64	0.00
条件冲击变量产生的交叉项	$GHA\times PPFE$	−0.16	0.00	−0.39	0.00				
	$OSA\times PPFE$					0.04	0.02	0.10	0.00
核心解释变量	GHA					3.07	0.00	3.26	0.00
	GHA^2					−2.88	0.00	−4.22	0.00
	OSA	1.00	0.00	3.29	0.00				
	OSA^2	−2.58	0.00	−8.36	0.00				
传导控制变量	$PFAI$	0.08	0.00			0.09	0.00		
	$PCGS$	0.36	0.00			0.33	0.00		
	$NAPP$	0.11	0.05			0.15	0.03		
	$URBA$	0.22	0.01			0.50	0.00		
	$dum1$	0.06	0.00			0.06	0.00		
	$dum2$	−0.01	0.13			0.04	0.00		
	$dum3$	−0.07	0.00			−0.09	0.00		
	$dum4$	0.21	0.00			0.19	0.00		
常数项	C	3.62	0.00	3.74	0.00	3.13	0.00	4.07	0.00
调整的 R^2		0.87		0.74		0.88		0.75	
F		361		501		381		542	
样本容量		636		636		636		636	

(四)假设 3 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

1. 经济行为依赖检验。表 5 中的方程(1)到(8)报告了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经济行为依赖。从表 5 的方程(1)到(4)可以看出,投资选择、消费选择和城镇化率分别与上级补助占比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 0.11、0.40 和 1.27,说明地方财政支出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经济行为依赖,增加投资和消费、推进城镇化能够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财政努力,实际上是抑制上级财政补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从表 5 的方程(5)到(8)也可以看出,投资选择、消费选择和城镇化率分别与上解支出占比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 0.25、1.26 和 1.32,同样说明地方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存在经济行为依赖。

表 5 结果主要表明,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存在经济行为依赖。据前文分析,上级补助和上解支出这两种机制分别在通过财政支出影

响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支出行为选择尤为重要，而较高的投资和消费水平以及较快的城镇化进程，能够激励地方政府改变支出行为。具体来讲：一是社会投资增加和居民消费旺盛等迹象将让地方政府看到经济增长的预期，因而更有动力改变政府的支出行为，将更多支出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环境改善，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在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下，大量的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保障这些居民的就业和消费，充分释放城镇化为县域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三是投资和消费直接创造经济增长的需求，城镇化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较高的消费和投资以及较快的城镇化进程将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财力资源，从而为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可能的空间。当然，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和城镇化推进等经济行为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财政支出行为及结构得到改善，同时也能够为这些经济行为的推进创造更好的环境，反过来也能促进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表 5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是否存在经济行为依赖检验结果

变量及检验指标		(1)		(2)		(3)		(4)		(5)		(6)		(7)		(8)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比较影响变量	GHA	1.87	0.00	−0.78	0.30	3.13	0.00	2.78	0.00	3.15	0.00	4.38	0.00	3.26	0.00	2.52	0.00
	GHA^2	−2.75	0.00	−2.38	0.00	−3.02	0.00	−2.80	0.00	−2.98	0.00	−4.02	0.00	−3.05	0.00	−2.60	0.00
	OSA	1.43	0.00	1.30	0.00	1.42	0.00	1.45	0.00	−0.81	0.41	−7.79	0.00	0.80	0.12	1.16	0.00
	OSA^2	−3.36	0.00	−3.07	0.00	−3.29	0.00	−3.42	0.00	−2.87	0.00	−3.64	0.00	−3.07	0.00	−3.01	0.00
条件冲击变量产生的交叉项	$PFAL\times GHA$	0.11	0.00														
	$PCGS\times GHA$			0.40	0.00												
	$NAPP\times GHA$					0.09	0.25										
	$URBA\times GHA$							1.27	0.00								
	$PFAL\times OSA$									0.25	0.01						
	$PCGS\times OSA$											1.26	0.00				
	$NAPP\times OSA$													0.79	0.16		
	$URBA\times OSA$															1.32	0.01
传导控制变量	$PPFE$	0.23	0.00	0.23	0.00	0.25	0.00	0.21	0.00	0.29	0.00	0.35	0.00	0.25	0.00	0.27	0.00
	$PFAI$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10	0.00	0.09	0.00	0.09	0.00
	$PCGS$	0.32	0.00			0.32	0.00	0.32	0.00	0.34	0.00			0.32	0.00	0.33	0.00
	$NAPP$	0.13	0.06	0.13	0.04			0.13	0.05	0.22	0.00	0.03	0.63			0.11	0.08
	$URBA$	0.58	0.00	0.60	0.00	0.53	0.00			0.53	0.00	0.51	0.00	0.53	0.00		
	$dum1$	0.06	0.00	0.06	0.00	0.06	0.00	0.06	0.00	0.06	0.00	0.08	0.00	0.06	0.00	0.06	0.00
	$dum2$	−0.03	0.00	−0.04	0.00	−0.03	0.00	−0.03	0.00	−0.04	0.00	−0.01	0.07	−0.04	0.00	−0.03	0.00
	$dum3$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11	0.00	−0.08	0.00	−0.10	0.00	−0.09	0.00	−0.07	0.00
	$dum4$	0.17	0.00	0.18	0.00	0.18	0.00	0.17	0.00	0.19	0.00	0.19	0.00	0.18	0.00	0.18	0.00
常数项	C	3.92	0.00	5.84	0.00	3.00	0.00	3.36	0.00	3.21	0.00	4.20	0.00	2.97	0.00	3.04	0.00
调整的 R^2		0.88		0.88		0.87		0.88		0.87		0.88		0.88		0.87	
F		358		360		357		373		343		297		357		346	
样本容量		636		636		636		636		636		636		636		636	

对比表 5 中的方程(1)到(4)和方程(5)到(8)，还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相较支出分权而言，存在更大的经济行为依赖。换句话说，投资、消费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更能带动上解支出占比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原因是上解支出占比的提高客观上与经济发展程度提升相伴随。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城镇化等经济行为将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加明显的经济增长预期，地方政府将更具有改变财政支出行为的动力，或者说财政支出发挥的边际生产能力更大。相反，上级补助占比的提高却是与经济发展程度降低相伴随，在此情况下，即便投资、消费和城镇化水平得到提升，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和提升这种行为的财政效率等也具有一定难度。另外，从表 5 中的方程(3)和(7)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能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针对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而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提升可能会促使地方政府将支出更多地用于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发展，但却忽视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

2. 地区特征依赖检验。表 6 中的方程(1)到(8)报告了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特征依赖。从表 6 中的方程(1)到(4)可以看出，特殊政策、民族特征、边境条件和贫富差距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0.07、－0.05、－0.1 和 0.22，即地方财政支出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特征依赖。具体来看，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县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上级财政补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相对积极的作用，而在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却出现相反情况。从表 6 中的方程(5)到(8)也可以看出，特殊政策、民族特征、边境条件和贫富差距与财政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分别为 0.65、－0.37、－0.45和 0.84，同样说明在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县或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上解支出占比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但在民族地区或边境地区则相反。

表 6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是否存在地区特征依赖检验结果

变量及检验指标		(1)		(2)		(3)		(4)		(5)		(6)		(7)		(8)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比较影响变量	GHA	3.01	0.00	3.19	0.00	3.11	0.00	2.62	0.00	3.56	0.00	3.47	0.00	3.14	0.00	3.82	0.00
	GHA^2	－2.91	0.00	－2.99	0.00	－2.95	0.00	－2.73	0.00	－3.22	0.00	－3.17	0.00	－3.00	0.00	－3.48	0.00
	OSA	1.43	0.00	1.40	0.00	1.40	0.00	1.42	0.00	1.04	0.00	1.55	0.00	1.24	0.00	1.13	0.00
	OSA^2	－3.32	0.00	－3.23	0.00	－3.28	0.00	－3.26	0.00	－2.49	0.00	－2.80	0.00	－2.39	0.00	－3.41	0.00
条件冲击变量产生的交叉项	$dum1 \times GHA$	0.07	0.00														
	$dum2 \times GHA$			－0.05	0.00												
	$dum3 \times GHA$					－0.10	0.00										
	$dum4 \times GHA$							0.22	0.00								
	$dum1 \times OSA$									0.65	0.00						
	$dum2 \times OSA$											－0.37	0.00				
	$dum3 \times OSA$													－0.45	0.00		
	$dum4 \times OSA$															0.84	0.00
传导控制变量	$PPFE$	0.24	0.00	0.25	0.00	0.25	0.00	0.25	0.00	0.27	0.00	0.25	0.00	0.24	0.00	0.31	0.00
	$PFAI$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08	0.00	0.09	0.00	0.08	0.00	0.09	0.00	0.09	0.00
	$PCGS$	0.32	0.00	0.32	0.00	0.32	0.00	0.32	0.00	0.32	0.00	0.32	0.00	0.33	0.00	0.34	0.00
	$NAPP$	0.13	0.05	0.11	0.08	0.12	0.06	0.14	0.04	0.07	0.34	0.15	0.02	0.10	0.15	0.06	0.37
	$URBA$	0.54	0.00	0.53	0.00	0.52	0.00	0.53	0.00	0.49	0.00	0.52	0.00	0.47	0.00	0.54	0.00
	$dum1$			0.06	0.00	0.06	0.00	0.06	0.00			0.06	0.00	0.06	0.00	0.08	0.00
	$dum2$	－0.03	0.00			－0.03	0.00	－0.04	0.00	－0.04	0.00			－0.04	0.00	－0.04	0.00
	$dum3$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09	0.00			－0.10	0.00
	$dum4$	0.18	0.00	0.18	0.00	0.18	0.00			0.17	0.00	0.18	0.00	0.18	0.00		
常数项	C	3.06	0.00	2.92	0.00	2.97	0.00	3.27	0.00	2.70	0.00	2.77	0.00	3.01	0.00	2.21	0.00
调整的 R^2		0.87		0.88		0.88		0.87		0.88		0.88		0.87		0.87	
F		356		358		357		358		364		360		351		337	
样本容量		636		636		636		636		636		636		636		636	

表 6 结果也主要表明，无论是财政支出分权还是财政收入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存在地区特征依赖，这种依赖主要是通过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支出行为发生作用。具体来看：特殊政策的支持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等特征，有利于财政支出行为的改善。较为明显的是，针对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县或发达地区，国家及省级政府均有指定的产业布局和区域规划等措施，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较为明确，另外，上级政府给予的特色产业等专项资金支持，也使得财政支出更加有针对性。因此，无论是上级补助还是上解支出，这两类特征都有助于发挥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相反，在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却未能产生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支出行为改善，一方面，因为民族县和边境县普遍较为贫困，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基本运转和特定的民族及边境公共事务，即便给予更多的上级补助也难以引导这些地区支出行为的改变，而如果提升其上解比重就更不可能引导这些地区将财政支出直接用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正如李丹和刘小川(2014)研究所指出，民族地区为了保持其“贫困县”帽子而发展意愿不高，边境地区实际上也是如此，这样就能继续获得更多的上级补助，部分地区还能消除上解支出，这些支出可能被用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协调各方面

的利益。同样，对比表6中的方程(1)到(4)和方程(5)到(8)，还可以看出，相较财政支出分权而言，财政收入分权存在更高的地区特征依赖。也就是说，在具有特殊政策的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县或发达地区，上解支出更能够促进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边境或民族地区，上级补助产生的分权抑制作用相对较小。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背景下，以云南省106个县为例，针对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倒“U”形关系，即随着上级补助占财政支出比重和上解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的上升，开始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越过拐点后将出现抑制作用。通过对传导机制的检验发现，县级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地方财政支出分权的负向影响和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具体来讲：经济行为依赖反映出辖区内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都将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从而抑制财政支出分权的负效应和促进财政收入分权的正效应；地区特征依赖反映出越是重点发展和富裕的地区，无论是上级补助还是上解支出都更加有助于促进财政支出行为的改善，进而有利于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在民族和边境等特殊地区，都未能产生财政分权推进县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此外，相较财政支出分权而言，财政收入分权存在更大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

在上述非线性计量模型估计基础上，以实现县域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采用刘金涛等(2007)的方法估计出：反映不同控制条件下支出分权的上级补助占财政支出比重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为47.99%－55.28%，反映不同控制条件下收入分权的上解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为19.27%－21.78%。通过与实际情况比较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县域的实际财政支出分权水平位于倒“U”形曲线的右半段，即随着上级补助占比的提升，县域经济增长将受到阻碍；大部分县域的实际财政收入分权水平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半段，即随着上解支出占比的提升，县域经济增长将会进一步提升。

上述研究揭示出现行地方财政体制运行普遍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激励功能开始退化。因此，要充分发挥财政在县域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及时调整地方财政体制，合理确定财政分权关系，致力于激发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保持财政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态势，具体而言：一是优化政府间收入分享体系。分税制以来，多数地方政府主要秉承“放权让利”的原则进行收入分享机制构建，结果是仅有发达地区上解支出占比较高甚至超过拐点并带来抑制效应，其余大部分地区均表现出上解不足。对此，总体上要增强省本级的收入分享比例，但针对超过收入分权拐点的地区要适度降低省级分享和上解比例。二是完善省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是适度控制上级政府对县级支出的过度补助，避免“养懒人”现象存在，包括：整合现行转移支付体系；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体系中要增大与经济发展积极性相关的因素的权重，减少针对特殊因素的考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要引入激励性的分配机制；强化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成效的考核和奖惩。三是建立激励性资金返还机制。通过政府间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调整，省本级将出现较多的盈余财力，考虑到既得利益，

有必要通过其他形式将这些财力返还地方。这种资金返还机制重点体现激励性，鼓励各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尤其是针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较高的地区，要给予其超率累进返还。四是完善县级基本财力的保障。通过政府间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后，就部分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将出现减少，甚至可能影响其基本运转。为了保障所有县域都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重点体现在政府基本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保障。五是加强其他方面的财政激励和引导。各地区还应该充分利用财政手段，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促进消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快推进城镇化等各项工作，继续保持县域经济发展等相关政策的推进，尤其是在民族、边境等具有特殊性质的地区，更要强化资金和政策的有效性。

主要参考文献：

[1]邓子基，杨志宏.省管县改革、财政竞争与县域经济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73－81.

[2]李丹，刘小川.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民族扶贫县财政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41个民族扶贫县的考察[J].财经研究，2014，(1)：4－15.

[3]刘勇政，赵建梅.论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差异——基于功能与地区多重分类考察的另类荷兰病分析[J].财经研究，2009，(12)：73－83.

[4]梅东州，王子健，雷文妮.党代会召开、监察力度变化与中国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4，(3)：47－61.

[5]王朝阳，余玉苗，袁灵.财政扶贫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2，(6)：23－25.

[6]王新军，赖敏晖. 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24－33.

[7]张淑翠.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1，(8)：135－144.

[8]周东明.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4)：30－35.

[9]Blanchard O，Shleifer A.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J].IMF Staff Papers，2001，48(4)：171－179.

[10]Huang Jr，Lo K，She P.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tax effort of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after the tax sharing system[J].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12，57(1)：1－22.

Th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ounty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Evidence from the Panel Data of 106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MIAO Xiao-lin[1]，FU Run-min[1]，WANG Ting[2]

(1.*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Public Policy*，*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 650221，*China*；2.*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Based on 106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下转第37页)

from a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enterprises, namely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corporate value can be expressed by a function of non-technical factor innov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value chain. Enterprises can accurately choose the strategic link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value chains, and achieve cost savings and excessive profits by effective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driving mechanism of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shows that the coadapt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the pursuit of profit maximum, external environments,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and strategies are all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finally revealing the realization path to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The case study indicates that Haier effectively controls costs and obtains profits through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at different strategic stages and its 30-year development i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istory of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factors from a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in order to adapt its own strategy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ully confirming the practical value of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theory.

Key words: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value chain; realization mechanism; driving mechanism; Haier Group

(责任编辑　许　柏)

(上接第 15 页)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ounty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t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county economic growth. Mainly through affecting the behavior of fiscal expenditures,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s th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The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relying on subsidies from governments at higher level has the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fiscal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relying on spending from governments at higher level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mainly depending on fiscal spending behavior determined by economic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it arrives at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that the effect of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fiscal spending behavior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county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depends on economic behavior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er is expressed by the increase in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s beneficial to incentives for changing fiscal spending behavior and the rise in the fiscal effort to improve county economic growth 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latter is expressed by the phenomenon that key development or rich areas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dvancement rol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ounty economic growth, but specific areas like ethnic or border areas are not the case.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related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and incentive role of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ount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c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unty economic growth; fiscal effor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　许　柏)